

袁宝泉
陈智贤

诗经探微

诗 经 探 微

袁宝泉 陈智贤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3插页 220,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40册

书号 10261·884 平装定价 2.10元

自序

《诗经探微》是我们近二十年来较系统地研究《诗经》所得到的部分结果。我们将这些单篇的文章结集成书，公之于众，是出于两点希望：首先是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以便有更多的人研究下去；其次是希望能引来读者的批评，以便在争鸣中使研究更加深入。我们想，这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我们自求学时代就对《诗经》怀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读懂它，我们阅读了大量研究它的专著，其间收益固然不少，但也时时产生一些疑惑：《诗经》中的某些作品，有时在这本书里是这么解释，而在那本书里又是另一种解释，意见完全相左，不知相信谁的好。不唯如是，有的时候甚至在同一本书中，对《诗经》里的同一个词，如“君子”，就一下子褒一下子贬，令人无所适从。特别是关于诗三百篇的作者问题更令人费解。在古籍毫无记录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著作竟然断定许多诗篇的作者为“劳动人民”。我们感到这似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社会进步、文化普及，文艺创作才会普及，而作品的艺术水平才会相对地比较高。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劳动人民”能够写出这么高艺术水平的诗歌，实在难以令

人置信。对此我们曾经拿《红旗歌谣》和《诗经》相比较，感到尽管《红旗歌谣》经过专业诗人和编辑加工润饰，然而它们的艺术造诣却比《诗经》逊色得多。《诗经》被传诵千古，而《红旗歌谣》很快就被人们忘却，其中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艺术水平低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的劳动人民也难以达到的造诣，远古劳动人民反而达到了，这实难使人理解。诸如此类的疑问激发起我们研究的热情。

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先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对《诗经》开始了零星的探讨。到了七十年代初，我们有了较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就进而对《诗经》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时间有了，但参考书籍却不好找，几经辗转，我们找到设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该馆参考部的同志在几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书籍，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她们热情而认真的服务，至今仍令我们感佩不已。

经过一番求索，我们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诗经》对春秋时人来说是“诗”，但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史”，然后才是“诗”。我们感到，只有将“史”和“诗”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得到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鉴于这种认识，我们的研究就不限于从文学、训诂学的角度，还比较注重从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和经济学等诸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并注意吸收这些学科上的新成果来充实自己的论证。我们不敢说目前已经完全做到，但我们是以此为目标，并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去做的。

二、《诗经》是经过统一整理和加工的，这在学术界早成定论。因此，在研究《诗经》时，应当也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统

一起来研究，遇有歧义应先从《诗经》本身找内证，以决定取舍。如对于《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句诗，我们就是从《诗经》本身找内证，证明“君子”不可能是被讽刺的对象，进而确定《伐檀》的主题的。另外，《诗经》是个选本，选本所反映的往往是编纂者的观点和眼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选本可以借古人文章，寓自己的意见。……读者虽读古人事，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集外集·选本》）孔子曾用“思无邪”这句话去评价《诗经》。什么是“思无邪”呢？东汉的包咸认为是“归于正”。我们认为包咸的解释是合乎孔子原意的。值得重视的是，春秋时“正”是个政治术语，凡事不违背周礼就可以叫做“正”。（详见《〈硕鼠〉、〈黄鸟〉新解》）孔子的意思是说诗三百篇全都合乎周礼，自然也合乎孔子本人之意，这样他才会以之来设帐课徒。孔子终生极力维护周礼，这也是早有定论的。明确这一点，对我们从总体上认识《诗经》是有益处的。

三、以往说《诗经》中有民歌，即《国风》和《小雅》中的诗大多来自民间，是民歌。然而这在先秦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先秦以至两汉古籍中的有关材料却恰恰证明诗三百篇并不来自民间，而是大都出自贵族之手。我们的研究证明，《伐檀》、《硕鼠》、《小雅·黄鸟》、《相鼠》、《七月》、《采芣》等名篇都不是民歌，并由此进而论证了《诗经》民歌说之不足信。

四、以往评论《诗经》时，基于《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为民歌，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了《国风》和《小雅》，而贬低了《大雅》和三《颂》。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探讨的。郭沫若同志曾指出，“《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

当简单”，“在《国风》中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分，没有什么悲壮的成分，这可说是一种缺点。”然而，《雅》、《颂》中那些长篇史诗不仅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叙事生动，而且充满着波澜壮阔的场面和丰富的史实。我们认为，如果说《国风》和《小雅》应当给予足够的估价的话，那么，《大雅》和三《颂》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也同样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诗经探微》的重点是评论《国风》，证明诗三百篇中没有劳动人民的作品，因此，关于《大雅》和三《颂》的研究文章没有收入。其实，《雅》、《颂》是很值得重新评价的。

本书中的《论〈魏风·伐檀〉》、《关于〈幽风·七月〉的几个问题》、《〈行露〉旧释质疑》、《〈硕鼠〉、〈黄鸟〉新解》等四篇文章，曾先后刊载于1981年至1988年间的《中华文史论丛》、《求索》、《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学术刊物上。这些文章发表时因受刊物篇幅所限，曾作了较大的压缩，如本来有一万多字的《关于〈幽风·七月〉的几个问题》在《求索》刊登时只有四千多字，未能充分展开。这次收入本书时不仅恢复了原貌，同时还作了较大的补充和改写，使文字更流畅，阐释更充分。回顾这些文章刊发的过程，我们由衷地感谢上述刊物编辑同志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尤其感激《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对我们的扶掖。当时，北京可以刊登这类文章的刊物本来不少，但我们的投稿接连碰壁，原因我们自然无法得知，可是已预感到当时在北京不大可能发表这样的争论性的文章。于是，我们把《论〈魏风·伐檀〉》投寄给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不久，我们收到了该刊编辑部长达三页的来信，信中除给我们以热情鼓励外，还对文章的论点和内容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对加强文章的严密性和提高其学术水平均有

很大的帮助。修改后的稿子后来刊登于该刊1981年第三辑上。这次此文收入时也经过了修订，字数由七千多增至二万余。

写翻案性或讨论性文章，必然要涉及一些先贤时哲的观点，这是无法回避的。批评古人较易处理，涉及今人就颇费踌躇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我国尚不时兴指名道姓的批评。《诗经探微》提及余冠英先生的观点和著作最多，还时时提到游国恩、刘大杰、张西堂和高亨等先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治《诗》的著作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近年出版的有关《诗经》的著作均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才不得不援引为例进行讨论。这几位先生有的虽然已经作古，然而我们神交已久，青少年时代就时常拜读他们的文章，在撰写《诗经探微》时我们案头上也一直放着他们的著作。其中特别是余、高两先生的著述对我们的启迪尤其大。这些专家前辈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应该尊重的。至于观点上的争论，我们想，这应是学术研究上的正常现象，绝不包含任何贬抑之意。

诗三百篇没有劳动人民的作品，这个论点不是我们提出的。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四十多年前，朱东润先生就曾发表题为《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的专文，驳难《诗》民歌说。我们先是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的注解上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但看到它时已是1982年秋，因为这时朱先生的《诗三百篇探故》出版了。我们佩服朱先生之卓识，但不知朱先生为何没有继续研究下去。

我们深知，本书的结论绝非至论，而充其量只能是一孔

之见，一家之言。我们愿以此就教于识者。由于学识和条件限制，疏漏以至谬误定当不免，我们恳切地盼望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教正。

作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广州

目 录

自 序	1
论《魏风·伐檀》	1
一、历代学者的解释	3
二、“君子”的职责和地位	12
三、《诗经》中之“君子”	15
四、本诗中之“君子”是天子或诸侯	28
五、不能苛求古人	31
《硕鼠》、《黄鸟》新解	34
一、关于《硕鼠》的主题	34
(一)“我”是农民,“硕鼠”是地主	36
(二)履亩税而《硕鼠》作	38
(三)关于“乐土”、“乐国”、“乐郊”	45
(四)“我”要“适彼”的原因和目的	51
二、关于《黄鸟》的主题	62
(一)“我”和“黄鸟”的关系	63
(二)释“复我邦族”	67
(三)关于“诸兄”、“诸父”	71
〔附〕“会朝清明”解	74
《行露》旧释质疑	
——兼论《诗经》中的“家室”	85
一、关于“女”	89
二、关于“角”和“屋”	93

三、释“家”、“室”	96
四、《诗经》中的“家室”	106
从“礼”看《相鼠》的思想倾向	118
一、释“礼”	115
二、“无礼必亡”	124
三、释“仪”、“止”	129
《秦风·黄鸟》反人殉说辨	
——兼论孔子不反对人祭和人殉	189
一、人祭与人殉	141
二、《秦风·黄鸟》仅反对以“良臣”为殉	147
三、孔子不反对殉葬制	157
《芣苢》与子嗣	
——兼论《诗经》中的祈子诗	167
关于《豳风·七月》的几个问题	189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190
二、关于“授衣”和“褐”	195
三、关于“我”的研究	201
四、关于“悲惨生活”	218
五、关于“朋酒斯飧”	218
谈《诗经》中之“君子”	227
一、从《关雎》中的“君子”说起	281
二、天子、诸侯、卿大夫皆可称为“君子”	289
三、“君子”是“邦家之光”	250
四、关于《邶风·雄雉》中的“君子”	258

评“淫诗”说	262
《诗经》民歌说考辨	285
一、自民间采诗之说起于汉代	287
二、司马迁提供的两条材料	295
三、凡可找到之作者均为奴隶主贵族	308
四、逸诗艺术水平低于《诗经》	307
五、朱熹“里巷歌谣”说不可靠	313
后记	336

论《魏风·伐檀》

《魏风·伐檀》是《诗经》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名篇。就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就曾讨论过它的主题。嗣后，在漫长岁月里，经学家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伐檀》的主题各抒己见，以致使本诗“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①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它的解释却渐趋一致。二十年代中期，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提出：

《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那时说‘君子’，犹后世说‘大人先生’，只是‘贵’的意思，并没有‘好’的意思。所说‘不素餐’犹说‘岂不素餐’。”^②

胡适先生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编第二章中也认为本诗中的“君子”乃是指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③

郭沫若同志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推崇《伐檀》等作品说“那儿的人的发现，那便是这阶级意识的觉醒的反映”，他认为既然“阶级的不平等已经发现了”，所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① 方玉润《诗经原始》。

② 《古史辨》第三册下编，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转引自魏建功《〈邶风·静女〉的讨论》（《古史辨》第三册下编）。

乃是“反语，今言为真是不肯白吃人的啦！”^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的论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认为《伐檀》等“一些民歌不但反映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②在谈到应当如何分析《伐檀》时，他特别提醒读者：

设想河边一群伐木的劳动者，对于不劳而食的“君子”，你一言，我一语，作这样的冷嘲热骂，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岂不是很尖锐吗？那个“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质问提出来是了不起的，这充分表现人民对于现实的清醒的理解。“不稼不穡”而“素餐”的剥削越加重，农民的反抗便更加强烈。^③

余先生还赞同郭老的意见，认为“这里‘不素餐’是以反语为讥刺”，《伐檀》这首诗是“反映被剥削者对于剥削者的不满。”^④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中对《伐檀》的赞许则更进了一步。他写道：

《魏风》的《伐檀》是一首刺贪的诗，刻画出当时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劳动果实的罪行。诗篇从一群劳动人民或劳工在河边上集体的劳动写起，“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用这些歌句突出地刻画出他们劳动的节奏，劳动的场所。他们的工作是有益于人民的，他们的环境是那样清白的；衬托出那些既贪而污的人，是如何卑鄙齷齪有害于人民。然后用质问语气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② 《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③④ 同上第71页。

继续着说“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是质问，也是咒骂。最后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作结。我们读到这诗，可以想象出这是一群匠人或工奴在他们工作中所发出的英勇斗争呼声。……是极具有教育人民作用，与很大感染力的。^①

六十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对《伐檀》的评价更高，简直达到了推崇备至的程度。例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伐檀》的“作者更以鲜明的事实启发了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点燃了他们的阶级仇恨的火焰”，“向统治阶级提出了正义的责问。”^②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说《伐檀》“这篇诗对不劳而获的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③有的研究文章甚至断定《伐檀》“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宣扬了奴隶创造历史的思想。”^④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典籍中的这一诗篇，倘若真有这么进步的政治主张和如此现代化的历史观，诚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认为以上诸家的评价和结论均值得商榷。我们的认识与上述诸家的见解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理解，《伐檀》是一首讴歌“君子”，宣扬“劳心者治人”的诗。

一、历代学者的解释

《伐檀》共分三章，各章内容和形式大体相类。为便于讨

① 《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8页。

② 《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 《古代汉语》上册二分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51页。

④ 《〈伐檀〉思想略辨》，《文史哲》1977年第3期。

论，兹录第一章于下：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每章诗都有九句，其中第七句中的“尔”（第五句“胡取”之前显然省略了一个“尔”字）和第八句中的“彼”字都是人称代词，分别指“你”和“他”。我们认为，这里称谓的变化表明诗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写的，而非如旧说那样以为是一问到底。这一前一后乃是提问者和回答者两个人，并不是提问者的自问自答。每章诗的前三句均描写在河边伐木的场面，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兴”的手法。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三）说：

再四思之，此首三句，非赋非比，乃兴也。兴体不必尽与下所咏合，不必固执求之，只是咏君子者，适见有伐檀为车用，置于河干，而河水正清且涟猗之时，即所见以为兴，而下乃咏其事也。

姚际恒从全局着眼，从“赋、比、兴”的角度分析，确定诗的前三句是写景，是一种“即所见以为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并不包含什么微言大义。我们认为他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倘若非要由这三句诗而推断出“他们的工作是有益于人民的，

他们的环境是那样清白的”，甚至认为这是“衬托出那些既贪而污的人，是如何卑鄙龌龊有害于人民”等一类结论，反倒使人感到十分牵强。其实，在诗三百中，“即所见以为兴”的例子是很多的，诗人用以起兴的事往往同所咏之事全然无涉。

我们认为，本诗的主要内容乃是每章中的中间四句和末尾两句。中间四句是对与“君子”有关的一些现象提出的疑问。“君子”不稼不穡，不狩不猎，居然“庭”中粮食堆成山，珍奇充下陈，这是为什么呢？末尾两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是诗的作者对发问者的回答。这个回答是解释性的，也是结论性的。因此，我们认为如何理解这两句诗乃是如何评价《伐檀》的关键，值得作深入探讨。事实上，自孟子至近代诸家，也正是围绕着这两句诗来讨论《伐檀》的主题的。

回顾一下古代学者对“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两句诗的解释，对我们搞清楚《伐檀》的主题将是大有裨益的。

如前所言，就现存的材料来看，最早对这两句诗进行解释的乃是孟子。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曾向老师问及这首诗：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①从这一对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孟子还是公孙丑，他们都并不认为诗中的“不素餐兮”是“反语”，含有讥讽反刺之意。他们的讨论是在肯定“君子不耕而食”的前提下进行的。只不过公孙丑对“君子”不劳而获厚，不耕而食

① 《孟子·尽心》（上）。

好，还受到《伐檀》的赞美不甚理解，于是向老师请教，而孟子则从“君子”的社会职能和作用着眼对这个问题加以阐释，指出“君子”在维护奴隶制度上贡献如此之大，赠以“不素餐”的赞誉是受之无愧的。显然，在孟子的心目中，“不素餐”尚不足以报答“君子”的功劳，同时也并不足以形容“君子”的业绩。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两句诗大约很有名，所以虽然汉代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但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已发现其中有七部书引用了这两句诗。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学者们的解释同孟子的见解竟是大致相同或相近。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中说：

《诗》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之治身。

董仲舒大约是把伐木者与“君子”等同起来了，于是才有“先其事，后其食”的说法。显然，董仲舒是嘉许“君子”治身有方的。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写道：

古者君子夙夜草草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

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

这里讲的是“君子怀德”，“小人劳力”的那一套儒家的政治主张。“劳心”的“君子”不必“劳力”，也“不素餐”，这是当时的社会中天经地义的事情。桓宽没有丝毫谴责“君子”的意思。在《盐铁论·国疾》中他还写道：

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

而家私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

在桓宽看来，“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的，只是那些“功德不施于天下”而一味中饱私囊的尸位素餐者，而并不是“君子”。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